

# 关于汉学的命运

阎纯德

在中国汉学研究的势头正健的时候 提出这个命题 颇令人感到疑惑。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悄然萌动了文化的热潮。教授在课堂上讲解文化，专家学者研讨文化，甚至作家也在作品里阐释文化，普通人也街谈巷议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镜子的学术专著和报刊，琳琅满目地呈现着中国文化的古老与传统、深沉与奥妙、现实与未来，——中国学界的面孔突然变得灿烂起来。

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 诸如整体性“ 传统文化 ”、“易经 ”、“ 儒学 ”、“ 比较文化 ”等等 都成为 专学 而研究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 汉学 ”的研究几乎成了显学 史无前例地被学界关注着。但是 就在这时候，关于汉学存亡的问题，国际上也有了不同的看法：瑞典汉学家罗多弼说，汉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不会持续太久，它将被各种具体学科所消解；“汉学系”迟早会取消；“没有什么理由要把中国人的经验当作与欧洲人的经验根本不同的范畴来阐释。”这种浮躁的见解，缺乏历史和科学的依据，既违背历史规律，也不合现在和未来的实际。中国文化经过外国人的智慧理解和消化 变成了“ 汉学 ”使其既是中国文化，也不完全是中国文化，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史，于是又被中国学界重视着 并构成中国的“ 汉学研究 ”。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影响或浸染西方的过程中，完全是冷静而自由的，是文化的一种自然运动，也是西方的先觉者的一种智慧的结果。人类文化的沟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但人类多元文化的“ 融合 ”和发展永远不会变为一体。在 21 世纪，“ 西学 ”和“ 中学 ”的“ 撞击 ”“ 冲突 ”和“ 融合 ”还会同时存在，“ 中学 ”不会消解“ 西学 ”，“ 西学 ”

也不会取代“中学”如果没有政治和宗教的“干预”它们会处于和谐平等的状态之中（这当然不是指具体的自然科学），以一种“文明对话”的形式，发展多元的人类文化。基于人类不同种群的文化历史差异人们的智慧特征也会不同因此对社会、历史、宇宙的阐释也会有别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将会存在下去。另外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最古老最灿烂的文化之一，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富矿，虽然曾经有过低迷的时期，但永远是吸引中国境外智者的研究探讨对象，更何况中国文化又是一种生命力异常活跃发展的文化，加之当代中国学术的自由环境，使中国文化有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发展、繁荣的机会，因此现代的或是未来的汉学家，可以在中国的文化资源里，发现中国的智慧之光。汉学家们可以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活动中偏重于诸如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等，但这些学科无疑都还属于汉学的范畴。在学术高度发展、学问越做越细的情况下，哪一位学问家也不会无所不知，其研究虽只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但大而言之，他还是汉学家。像中国人不会放弃研习外国文化那样，外国人也绝不会放弃研究中国文化。所以“汉学”不会消亡“汉学研究”也还将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关于汉学时下有的叫国际汉学、海外汉学、世界汉学当然有的也称中国学。以上几种叫法，逐渐摆脱了沿袭汉代以来将重经、史、物、训诂考据之研究称之为“汉学”的范式逐渐把“汉学”和“国学”分开。当然也有另一种理解认为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研究的是中国文化且是偏重古代文化的学问就是“汉学”。这种情况可在一些汉学论集或是一些名家的文章里看到。但我始终认为，还是把汉学(SINOLOGY)和国学分开为好。因为我更强调和看重近百年来国际文化的习惯认识趋向。把汉学与国学分开，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不过话再说回来，学界仍然可以各做各的事情，各做各的学问，从不同方面自己力所能及地对“汉学”进行研究。当“汉学研究”在国内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科，并更高地扬起风帆的时候，我们这些不太多的研究者应该紧密地联手群力远航以达彼岸港湾。我很赞同李学勤教

授的意见：“在中国 习惯上只把外国的这种学术研究叫做汉学 约定俗成，似乎也不必更改。”

在中国，“汉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对汉学研究的反馈。现在 虽然已有像《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孙越生主编)《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国外中国学研究》(张良春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国际汉学研究丛书》、《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汉学研究》(阎纯德主编)《汉学漫步》(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龙巴尔、李学勤主编)《世界汉学》杂志(刘梦溪主编)及若干部关于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等，这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汉学研究，都有推动作用。因为“汉学”被岁月尘封得太久 被政治禁锢得太严 所以它的空白还很多 大量的“汉学”资源我们没有深入发掘或是还没有顾及 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还远远没有做。

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到文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斗争”“反思”过程。21 世纪在经过信息学、生物学、太空学等领域的科学爆炸之后，人类社会也会出现安静或停滞的历史时期，但是社会和生活将是有序、冷静和自在的 这给各种文化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借鉴、沟通、融合一个机会。汉学和汉学研究也有一个机会，——也许它成了一个“古老”的学科 但它没有消亡 也不会消亡。

在中国历史上 凡是开放的年代 汉学就发展 其研究也就繁荣。21 世纪的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汉学也会更加健康地发展，其研究也必将有一个新的起点。

1998 年 6 月 27 日 北京西三旗九龙窝

#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

熊文华

## 一 传道团奠定了俄国的汉学研究基础

### 1.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是宗教和外交的产物

中国和俄国是邻邦，两国交往始于何时史书记载不详。本世纪 40 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的叶尼塞河中游曾发现中国汉代式样的院落建筑，后来又在里海西北、高加索和撒马尔罕等地相继出土汉代铜镜和箭头之类的文物。西伯利亚各地居民与中国边民在历史上早已有往来，只是在俄国势力范围东扩之前俄国人并不了解中国。据说 1567 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俄国就派遣布尔纳什·亚雷切夫（Yallysheff Burnash）和伊万·彼得罗夫（Ivan Petroff）<sup>①</sup>作为使节来华，但是此事在中国史籍上无从查考，很可能是一些西方学者的揣测。<sup>②</sup>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时代的外务衙门档案中曾发现两封中文书信，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翻译，直到 1675 年才由俄国赴华使臣斯帕法里（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Спафарий）带到达托博尔斯克，找一名懂汉语的军役译出，被认定为分别写于 1619 年和 1649 年中国皇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sup>③</sup>。1655 年（清顺治十二年）使臣巴伊科夫（Федор Исакович Байков）携带沙皇致“中国博格德汗的国书前往中国汗八里”（当时俄国人对清朝皇帝和北京的称呼）这是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位俄国来华专使<sup>④</sup>。1678 年从北京返俄的斯帕法里所写的《亚洲最早住人地区记述——包括中国及其省市》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历史、疆域、行政区划、宗教、物产、人口和风俗，虽然直到 1901 年才刊行问世，却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详尽记述

中国情况的史籍。

从历史上看,16世纪80年代以前,俄国历代沙皇在对外关系中关注的只是对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的争夺,无暇东顾。16世纪末以后俄国势力越过乌拉尔山脉不断东扩,与中国边民接触频繁,进而发生边界之争。1689年中俄签定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边界的大致走向,两国交往增加。清廷解除外国人来华旅行的禁令以后,俄国的探险家、商旅、外交人员、学者活动的范围逐渐由西向东由境外深入中国腹地。按照清朝的夷务政策,俄国一直是中国北方陆路的通商之国,但是1805年俄国美洲公司的海船涅瓦号和希望号曾先后驶抵澳门,探求在中国南方沿海城市通商的可能。

1685年清军在雅克萨战争中俘虏近百名俄国士兵(俄国史籍称他们为“阿尔巴津人”),康熙御准将他们和一些逃亡中国的俄罗斯人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驻扎于北京东直门,享受旗人待遇。这些俄籍士兵都是东正教徒,经特许把胡家圈胡同的一座关帝庙改为“罗刹庙”由马克西姆·列昂节夫(Максим Леонтьев)司祭。1695年俄罗斯东正教派遣执事劳伦斯·伊万诺夫来京主持宗教仪式并将罗刹庙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即“北馆”原址位于今俄罗斯驻华使馆)。1715年俄教会派遣修道院院长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Илларион)大司祭率领11人的传道团,随返国清使图理琛来京,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届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道团。1728年(雍正六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中规定:“萨瓦(俄特命全权大使,Лукич Владиславич Савва)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丁语之二人,令在此处俄馆居住给予盘费养贍。”这个“俄馆”就是“俄罗斯馆”是由北京玉河桥西东江米巷即现在的东郊民巷的会同馆改建的俄罗斯奉献节教堂(即“南馆”)实际上是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1860年以前的驻地。1729年第二届俄国传道团来华,此后大约每十年换团一次,1850年后轮换时间缩短为五年至1900年共18届。俄国传道团一般由大司祭一人、司祭二人、辅祭一人和随团学员六人组成。清朝历代皇帝允许俄国传道团来华,一方面是因为早

期东正教在京神职人员基本采取自养自传的策略，俄国政府和教会训令他们凡事谨言慎行，因此不像当年在华的天主教徒那样广布福音，参与宫廷内部权力之争，甚至想改变中国人拜天祭祖的习俗；另一方面是闭关自守的清廷认为俄国人来华诵经读史是畏威怀德，慕义向化，是天朝文治武功的结果。1805年清政府军机处破获耶稣会士德天赐私寄路程详图，责成第8届传道团学员斯捷班·利波夫佐夫和伊凡·马莱晓夫将图中拉丁文译出，从此传道团学员更博得清朝大臣的好感。至于东正教向北京以外城市的扩展，在哈尔滨、上海、天津和迪化、乌鲁木齐等地建立教堂67座的情况，那是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事。

虽然俄国在北京建立的东正教会是一个涣散的组织，派驻的传道团是一个拼凑而成的团体，但它毕竟是宗教和外交结合的产物。18届传道团共计约200人，早期只包括神职人员和学员，后来外交人员、医生、教师、画匠、科学家也准予随团，带有浓烈的官方色彩。除直接接受俄罗斯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领导外，1807年以后俄国外交部还专派一名监护官随团来华。它是清朝理藩院和俄国枢密院之间的联络站，也是俄国收集中国情报的情报站。1860年俄国正式在华设立公使馆以前，俄国的汉语、满语、蒙语通事和教习都在传道团诵习过经史子集。

17世纪以前很少俄国人懂汉语。俄国文学界熟知的《赵氏孤儿》和《好逑传》等中国文学名著都是从法文和德文转译的。中俄两国政府间的交往不得不借助拉丁文，例如《尼布楚条约》是用满、蒙、汉、俄、拉五种文字写成的，其中的拉丁文本最为重要，两国外交代表的签名盖章都在这个文本上。来华传教士和随团学员也以是否掌握拉丁文为其选拔的重要标准之一，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编写的《拉丁文汉文辞典》成了他们案头工具书。清政府曾于1728年在国子监开设俄罗斯学馆，帮助俄国学员学习满语和汉语。清内阁亦于1757年开设俄罗斯文馆（又称“内阁俄罗斯学”馆址在今东华门北池子街西）从八旗子弟中遴选学员24名，延

聘俄方教习。这是清朝最早成立的一个西文馆。1862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属同文馆的英文馆正式成立，翌年原俄罗斯文馆裁撤并入。

俄国东正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早于基督新教但是晚于天主教。尽管在前几批传道团中的不少成员酗酒懒散、鲁莽放荡、操守不端，特别是跟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来华的西欧传教士相比，显得文化素质低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道团中训练有素的学者和勤奋好学青年的人数逐渐增加。正是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创性的工作，才使俄国人对中华文化从不了解到有所了解，从间接跟中国接触到直接与中国人交往。从严格意义上说，传道团奠定了早期的俄国汉学研究基础，有些人后来还成了著名汉学家。

罗索欣 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оссохин 又译“罗索兴”、“罗索金”、“拉索欣”(1707~1761)，早年就读于伊尔库茨克的蒙语学校，1729年随第二届传道团来华，居京11年。1735年被录用为清政府理藩院的俄语通事，后任俄罗斯文馆教习。他曾经编写过《俄文翻译提要》供中国学员使用用俄文音译《皇清一统图》的中国地名。此外他还编写过《1730年中华帝国大事汇》(记载了当年日蚀、地震以及黄河泛滥灾情)、《1735年各省征收钱粮登记册》(记载了土地税、人头税、典契税等情况)。1739年他开始把满文的《八旗通志》译成俄文，共完成全书16卷中的五卷，注释极为详尽。1741年回国后任职于俄国帝国科学院，并在圣彼得堡卫戍部队子弟学校东方语言训练班担任汉语和满语的教习工作。1745年至1750年他把满文的《康熙大帝征服喀尔喀和额鲁特史》译成俄文，1750年着手注释《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和《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他把清使图理琛的《异域录》俄译成《1714年出使伏尔加河喀尔木可汗阿玉奇宫廷之中国使臣在俄国旅行之概述》于1764年在穆勒主编的《科学问题月报》上发表被公认为最成功的译本。1757年他还利用中文资料编译了《丝绸的制造》并附注释。他先后编译的书近30部之多还收藏了100多部有关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书籍，捐赠给帝国科学院。法国俄罗斯历史学家葛斯顿·加恩说：“罗索欣是在北京的俄国正教会中在科学上值得

嘉奖的人物之一，从最初起，他的工作显然就在外交和科学上有极高的价值。<sup>185</sup>

列昂节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 又译作“梁捷夫”、“列昂季耶夫”, 1716~1786), 1743年随同俄国信使来华, 后与第三、四届传道团随团学员一起学习汉语, 居京12年。他也曾被录用为清廷理藩院通事兼俄罗斯文馆教习。1756年返俄, 供职于俄罗斯外交部, 翌年与罗索欣合译《八旗通志》完成11卷以《满族和八旗军的起源及情况详述》为书名于1784年由帝国科学院出版。1763年他提议创办圣彼得堡满汉语学校, 任教多年, 曾编写《满汉词汇解》。1768年中俄修订恰克图条约时他任俄方首席翻译。1780年他翻译的儒家经典四书在俄问世, 注释详尽。此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又指示他翻译《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和《雍正朱批谕旨》等中国文献, 他的《中国思想》被欧洲汉学界公认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著作, 1778年被译成德文, 1807年又被译成法文。他一生共编写或译著《中国臣子》、《中国君主》、《圣贤格言》、《三字经》等20部有关中国史地、文化方面的专著, 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之一。

利波夫佐夫(Степан Липовцов, 又译名为“四贴班”, 1770~1841), 1798年随第八届传道团来华。曾编写《中华帝国大事简记》、《向中国皇帝进贡的民族介绍》、《关于土尔扈特迁俄及其返准噶尔经过》、《准噶尔概述》等专著。返俄之后他供职于外交部, 先后编著《拉丁语汉语辞典》、《满汉俄语辞典》、《满语识字课本》等辞书和教材, 是俄国早年著名的满语学家之一。

## 2 传道团造就了一批了解中华文化熟悉东方事务的人才

18世纪末, 随着俄国加速对远东地区的扩张, 传道团的工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沙皇直接过问成员的选派工作, 俄国教会和政府曾对传道团事务进行多方干预, 隶属关系由西伯利亚事务衙门转到俄国外交部。他们还提高了成员的选拔标准, 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增加活动经费和生活补贴, 对成员在华的学术研究范围和方向施加了种种影响。从第十届传道团开始, 俄国增派了随团大夫和学者,

成员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与中国社会的接触面进一步扩大，选题与俄国当时的外交人才培养、边疆和贸易政策制订以及汉学研究工作直接挂上了钩。如果说早期传道团成员的研究热点只是汉、蒙、满、藏语 中国北方中段和东段疆域、边界历史、地理和居民成分的话 那么从 18 世纪末以后，他们就把研究范围全面扩大到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政治、宗教、法典和习俗 对中国西北部疆域和历史表现出特殊的热情，对中国国情和古典文学也不断有所涉及。传道团利用中国的语言环境造就了一批熟悉东方事务、了解中华文化、具有献身精神的人。1858 年中俄天津条约和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之后 传道团培养出来的学员为俄国开展对华外交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毕丘林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 又译为“比丘林”“彼丘林”“俾邱林”，1777~1853），他的教名是亚金甫（Иакинф），夏真特神甫，第九届传道团大司祭。1808 年来华 居京 14 年 结交满、蒙、藏上层人物 先后学习了汉语、蒙语和满语 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回国时曾发运数吨重的中文书籍。他是 1813 年天理教起义的见证人和同情者，曾记录了他在事件发生时的所见所闻。据说他平日言行放荡不羁，在理藩院召集的一次第九届传道团全体人员会议上被指责为行为不端。他先后把四书《蒙古律例》、《资治通鉴纲目》和《大清一统志》等书译成俄文。1822 年 1 月回到彼得堡后，因没有完成使命被宗教法庭指控，后被关押在瓦拉姆修道院。祷告之余，这位离经叛道的汉学家便着手整理在北京编写的《西藏青海史》、《蒙古记事》、《准噶尔和东突厥的远古及现状》和《成吉思汗王朝的前四汗史》手稿。1828 年他成为帝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考古学通讯院士。1829 年他出版了《北京纪事》一书和他所翻译的《三字经》。1832 年俄国外交部委派他去恰克图汉语专科学校督导教学工作 其间他翻译了《大清会典》并编写了《汉语语法》等书。1838 年他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式著作摘录》，1840 年出版了《中国及其居民、道德、风俗与教育》，1842 年又编写出《中华帝国统计概要》，1844 年出版了《中国农业》，1848 年他的《中国公民与道德状况》问世。晚年他在潦倒贫病中费时三年编出《古

代中亚各族资料汇编》一书于去世前两年出版。他与诗人普希金、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和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等文化名流都有密切的交往，反对用轻蔑笔调来描写中国的历史，是一位有卓著贡献的俄国汉学家。

卡法罗夫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в 又译“巴第”“巴拉第”，1817～1878）教名鲍乃迪（Palladius）生于喀山。1840年以大司祭身份随第十二届传道团来华，居京7年，返国后晋升为教长。1849年以第十三届传道团团长身份再次来华，客居10年。他曾编写两卷本的《汉俄合璧韵编》收11800余汉字，创制了一套用俄文拼读汉语的语音体系，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自己日记中记录了1858年英法联军侵华时的所见所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1865年他再次以第十五届传道团团长身份来华。1870年至1871年间参加乌苏里边境地区考古和人种调查队的调查工作，先后撰写了《1847年和1859年蒙古纪行》、《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乌苏里边界地区简史》等著作，为俄国政府与中国谈判中段和东段边界搜集资料。此外他还著有《金七十论》、《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略》翻译《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皇元圣武亲征录》、《塞北记行》、《圣武记》注释《马哥孛罗北游记》创办过汉学杂志《俄国驻北京传道团成员著作汇刊》。卡氏1878年退休，返国途中客死法国马赛。

扎哈罗夫 Иван Ильич Захаров 又译为“杂哈劳”，1814—1885），1840年随第十二届传道团来华，1851～1864年先后任俄国驻伊犁领事和总领事。他精通汉语和满语，1851年曾参加中俄双方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谈判。1862年以全权代表身份参加中俄边界会勘，两年后又强制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回国后被指控为无能，不得不离开了外交界。1869年任教于圣彼得堡大学，1875年获满语博士，四年后任该校教授。他曾编写过《满俄大辞典》、《满语语法》、《中国西部疆域记》和《巴尔喀什湖地区情况简述》等书，此外还著有有关中国土地所有制和国民经济方面的专著《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和《中国人口的历史考察》。他组织绘制的《新疆详图》曾获国际地

理学会大会奖。

王西里(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иевич 又译“魏西里夫”、“瓦西里耶夫”、“华西里也夫”,1818~1900),1834年进入喀山大学东方学院攻读蒙语、汉语和满语,师从西维洛夫。五年后以《佛教哲学的基础》的毕业论文通过答辩,获得蒙语硕士学位,继而获满语硕士学位。1840年随第十二届传道团来华,居京十年,除进修汉语和满语外,还学习了藏语、朝语、日语和梵语,并广泛收集资料。1855年任接替圣彼得堡东方学院沃伊霍夫斯基的教席,成为该校第一位汉语教授。1864年获汉学博士学位。1857年至1869年他连续发表了《佛教教义、历史与文献》,先后被转译成德文和法文。1868年他发表了《论语》的俄译注释本,1866年至1884年他编写了两卷本的《汉字分析教程》以及按部首检索的《华俄辞典》。他还先后发表了《东方的宗教:儒道佛》、《在毗奈耶基础之上发扬光大的佛教》、《佛教概述》、《佛教术语辞典》、《佛教文献选评》等有关宗教的论著。1880年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在圣彼得堡问世,介绍了中国的小说、戏曲、诗歌和散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史”。<sup>⑥</sup>除此之外,他还著有《十至十三世纪中亚细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元明两代的满洲》、《中国的穆斯林运动》、《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中国历史》、《中国地理概述》、《西藏地理》、《满洲概述》、《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年表》等。1866年他被选为帝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当选为院士,1878年至1893年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主任,是俄国现代汉学的奠基人之一。

孔琪庭(Konstantin Andreianovich Skachkov 又译作“孔气”、“孔琪”、“斯卡奇科夫”,1821~1883),1849年随第十三届传道团来华,曾任天文师。在京期间常出入茶楼酒肆、田家农舍,体验民情风俗。他留下的手稿内容颇广,诸如《中国的风俗》、《中国的烹调》、《京郊运河边的茶馆》、《温泉乡农家生活小景》、《中国的农业》、《中国的蚕丝业》、《中国的手工艺艺术》、《太平天国叛乱时期的北京》等。1857年因病回国,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译员,1859年至1862年被派驻塔

城任领事。1867 年至 1879 年 先任俄国驻天津领事馆领事 三年后晋升为总领事，因交涉教案事常奔走于津沪官商之间。他喜爱并购买了大量中文古籍，对于各类善本图书尤甚。

科瓦列夫斯基 *Егор Петрович Ковалевский* 又译作“廓瓦烈幅斯启”)，1849 年随同第十三届传道团来华，1851 年以全权特使身份与清政府代表伊犁将军奕山进行谈判并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6 年任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853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游记》。

### 3 非传道团出身的俄国汉学家

由于历史原因 俄国的蒙语、满语教学略早于汉语。1725 年俄国东正教会在伊尔库茨克开办了一所蒙语学校，以便为传道团输送来华学员。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喀山大学也设立蒙古语讲座，聘任鲍波夫 *А. Уас. Попов* 为教授。1830 年曾经陪同第十一届俄国传道团来华后回国的柯瓦列夫斯基 (*O. M. Kovalevsky*) 被喀山大学聘为教授 将带回的一批汉、满、藏文图书捐赠给该校。蒙语讲座后来转移到圣彼得堡。1837 年，第十届传道团的达尼伊尔·西维洛夫 (*Daniel Sivilov*) 又在该大学开设汉语讲座，聘任与他同届来华的医生沃伊霍夫斯基 (*Vaihovski*) 共事，后来接替了他的职位。1763 年圣彼得堡开办满汉语学校，1832 年在恰克图成立汉语专科学校，1899 年海参崴设立东方学院，1902 年增设东亚学院，又成立了俄罗斯东方学会。1854 年尼古拉一世敕令将全俄东方语言学科并入圣彼得堡大学 该校便成了俄国汉、蒙、满研究学者的荟萃之地 俄国的汉学研究从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俄国的汉语译员、汉学家和对华外交官员的培养基地不再局限于北京传道团和俄罗斯学馆，而是扩大到了俄国国内的院校；俄罗斯学者也不再停留在对汉学的一般性研究，而是在选题范围、研究方法和与现实结合诸方面树立起俄罗斯汉学学派的独特风格。他们对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理解往往比西欧的汉学家深刻、独到。这虽然得益于俄国与中国比邻所赋予他们的那种东方人文精神，但是主要还是他们在学术上的刻苦钻研以及俄国当局的

授命。人们所熟知的俄国早期非传道团出身的汉学家和对华外交官员有：

贝勒 Emill Vasil'ievitch Bretschneider 又译“勒士奈德”、“布雷特施奈德”，1833~1901）是 1866 年至 1883 年俄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大夫。工作之余，他潜心研究中国的植物分布和种类以及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在《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会刊》上曾用英文发表过多篇论文并撰写了《中世纪西行记》（1875）、《中西亚地理和历史》（1876）、《对有关马可孛罗华北之行的中国史料的译释》（1876）、《早期欧人对中国植物之研究》（1881）、《元明人西域史地论考》（1910）、《古代中国人所了解的阿拉伯人及其殖民地与西域》（1898 筹专著。曾被聘为法国文学研究院通讯院士和巴黎地理学会会员。返国后蛰居圣彼得堡。

柏百福(Pavel Stepanovich Popoff 又译作“鲍波夫”、“波波夫”，1842~1913)，1870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汉、蒙、满语专业，调入俄国外交部，先后两次任俄驻华使馆翻译。1886 年升任为驻京总领事，居京 30 余年。1879 年出版《俄华辞典》，1888 年完成了对卡法罗夫的《汉俄合璧韵编》的修订，获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称号。1902 年退休回国后任母校编外汉语教授。他还编写过多部汉语和中国历史地理著作，译释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一位俄国国内培养出来的有成就的汉学家。

璞科第(Dmitrii Dmitrievich Pokotilov 又译“波科季洛夫”，1865~1908)，蒙古学家，1887 年起任职于俄外交部，翌年任俄驻华使馆的实习翻译，1905 年晋升为俄驻华公使。1893 年他发表了《明代东蒙史》和《五台山今昔——1889 年 5 月旅行报告》，1895 年出版了《朝鲜与中日间的冲突》等书。1908 年卒于北京。

伊凡诺夫斯基(Aleksei Iosifovich Ivanovsky, 1863~1903) 1885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后来留母校任教，通晓汉语、蒙语、满语和藏语。1888 年出版了《使臣斯帕法里一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等书。1889~1891 年伊氏到中国东北等地进行调查，回国

后撰写了《满洲文献选编》和《满洲研究》等专著。

卜郎特(J. J. Brandt 又译“勃兰特”, 1869~1946) 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毕业生, 最初供职于俄国中央政府财政部, 1901 年受聘于哈尔滨中东铁路局法律学校, 曾任俄语教授和副校长等职。后任北京俄文专修馆教授、北洋政府外交部法律顾问。1926 年至 1933 年受聘于美国私立华语学院 教授汉语。编写过《语体文小品词》、《现代报刊汉语》和《汉文初阶》等。后一册教材于 1927 年在北京出版, 1936 年再版 课文内容包括《聊斋》故事、外交函电、法律条例和信函格式等。语法讲解详尽 用英文解释 古文附白话翻译。1946 年卒于北京。

## 二 十月革命后汉学研究的新局面

1917 年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的汉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1、第一阶段 百废待兴中的发展

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 原有的两个汉学研究中心——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和 1909 年创建的东方科学研究所以及海参崴东方研究所, 由于内战、饥馑和外国干涉, 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1919 年根据列宁签发的政令把拉萨里夫东方学研究所改名为亚美尼亚研究所。1920 年 由于 В. М. 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斯梅凯洛夫(Г. Ф. Смыкалов) 等教授加入了研究人员的队伍, 根据人民委员会的训令“为了开展当代东方语言的教学和应用东方学的研究”, 彼得格勒<sup>①</sup>的亚美尼亚研究所改建为中央现代东方语言研究所。В. М. 阿列克谢耶夫通晓汉、满、蒙语 是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入室弟子 多次来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 特别是古诗词有过深入的研究, 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如: 文学史专家王希理(Б. А. Васильев)、费德林 Н. Т. Федоренко)、艾德林(Л. З. Эйлин)、波兹涅耶娃(Д. Д. Позднеева), 哲学史专家彼得罗夫(А. А. Петров), 语言学家舒茨基(Ю. К. Шуцкий) 以及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 等。В. М. 阿列克谢耶夫曾亲自为列宁格勒大学学生编写过汉语教学大纲、汉语教科书并制订过一套汉字拉丁化拼写系统。

另一个汉学研究中心是 1920 年在莫斯科拉扎列夫斯基东方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东方语学院，1921 年改名为莫斯科东方学院后曾从列宁格勒调派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和日本学家波里瓦诺夫到该校工作。郭质生（В. С. Колоколоу）是该校一位博学多才的汉学专家，早年在中国受过教育，熟悉儒家经典，对于汉字和汉字教学法有独到研究，编写了苏维埃时代第一部汉语工具书《汉俄简明辞典》，把他校订的章士钊的汉语语法俄译本作为该校教材。词汇和文字史专家鄂山荫（И. М. Опанин）和郭路特（Н. Н. Коротков）都是他早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莫斯科东方学院汉语教研室在郭质生和后来的郭路特领导下每年都招收几十名学生。

海参崴东方研究所恢复活动之后，老一辈的汉学家，诸如帕史科夫（В. К. Pashkov）、库纳（N. V. Kuner）、卢达科夫（A. V. Rudakov）等教授亦投身于新时代汉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汉学基本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工作，着重于中国古典文学、古汉语、古代史、古典哲学、历代经济和农业政策，语言学家往往按照印欧语系的语法框架来分析汉语语法现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十分注意培养新型的汉学研究人才，从现代学科领域确定选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学术活动建立在严格的学科原则上，分工更加专门化。这一点与旧汉学截然不同，标志着俄罗斯汉学研究新纪元的开始。

俄国原有一刊物《学士院汇报》（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й Наук）主要发表东方学研究论文，根据这些论文再选编出版《亚细亚论丛》（Азиатский Сборник）。1918 年该论丛又开始发行一种《新论丛》（Новая Серия）。为了更好地组织并协调研究工作，1921 年 12 月全苏中央执委会决定建立全苏东方学科学协会，出版《新东方》杂志，汉学是该协会研究项目中的一个重点。该会的远东分会由满语学家格雷奔史奇科夫（A. V. Grebenschikov）领导，后来连续出版了多期《通讯》，刊登了许多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珍贵资料。

苏维埃时代汉学界存在两个学派：一是以列宁格勒大学为大本

营的古典汉学派，那儿有规模最大的亚洲博物馆东方图书馆，学者们主要研究古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另一个是汉学新派，成员多半是莫斯科的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和学者，主要研究当时的中国国情和革命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人民对中国的事态十分关切，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例如：维伦斯基—塞里布里亚科夫 (V. Vilensky—Serebryakov) 研究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和国民党统治的文章，特里特亚科夫 (S. Tretyakov) 的《中国》郭质生和马迈耶夫 (I. Mamayev) 的《中国 国家人口及其历史》伊凤阁的《红缨枪》和《中国来信》。苏联汉学家还写了许多文章和专著介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例如：达林 (S. Dalin) 的《在中国革命队伍中》(1926) 尼可莱·柯斯达里夫 (Nikolay Kostarev) 撰写的《我的中国日记》(1928)，鲍波夫 (A. Popov) 的《中国的工会运动》(1926) 斯穆吉斯 (Smurgis) 的《中国及其工运》(1922) 海殷 (A. Khain) 和海亚玛 (U. Khayama) 有关中国工人阶级的论述等。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的专著还有：库纳教授的《中国政治生活论集》(1927)，卡恩斯基 (K. A. Kharnsky) 的《中国的今昔》(1927)，斯坦因 (V. M. Stein) 教授的《中国财政危机论集》等著作。《布尔什维克》、民族和殖民研究协会出版的《革命东方》都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为了帮助汉学家对正确解决东方民族的革命运动、历史、经济和文化等问题的理论探索，苏联还专门出版了一些政治书籍，如 纳里马诺夫 (N. Narimanov) 和彼得罗夫斯基 (D. A. Petrovsky) 合著的《列宁著作中有关东方与革命的论述》、塔施卡罗夫 (P. Tashkarov) 编辑的《列宁论中国文集》等。这对于提高苏联汉学研究的理论水平无疑发挥了一定作用。

根据高尔基的倡议，1922 年彼得格勒出版了一本名为《东方》的杂志，先后发表了 B. A. 阿列克谢耶夫 (B. A. Алексеев) 和王希理等人翻译的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此外还有舒茨基翻译的《7~9 世纪的中国抒情诗集》(1923)，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B. M. 阿列克

谢耶夫翻译的三卷本《聊斋故事》卷名分为：《仙狐》(1922)、《魔侯》(1923)和《奇谈》(1928)。B. A. 王希理和施图金(A. A. Shtukin)所译的鲁迅短篇小说是苏联读者最早读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伊凤阁是早期苏联研究汉语有成就的一位汉学家，也是苏联西夏学奠基人之一。他生于1878年，190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汉满语专业，1902年来华担任俄文馆教习，1923年被聘任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24年为苏联驻华使馆首任参赞。著作有《西夏国书说》(1923)、《华语初级课本》(1910)、《汉语口语初级读本》(1911)等。

## 2、第二阶段：战争岁月中的奉献

这一阶段反映了从二十年代末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汉学研究的情况。1929年共产主义学院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所，集中了为数不少颇有才干的汉学家，例如安德里耶夫(G. M. Andreev)、阿布拉姆森(E. M. Abramson)、约尔克(E. Iolk)、格里内维奇(P. Grinevitch)、卡萨宁(M. I. Kasanin)、郭质生、伊凤阁、郭绍棠(Go Shao-t'ang)等人。列宁格勒的苏联东方学院，除王希理、弗鲁格(K. K. Flog)、舒茨基等经验丰富的汉学家以外，还聘用了年轻的研究人员，例如彼得罗夫、西蒙诺夫斯卡娅(L. V. Simonovskaya)、施普宁津(A. G. Shprintsin)等。

在那枪林弹雨的岁月里，许多苏联汉学家积极投身于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布纳科夫、弗鲁格、拉苏莫夫斯基(K. I. Rasumovsky)、茹多夫(L. N. Rudov)、卡拉-穆扎(Kara-Murza)、格雷奔史奇可夫等汉学家，先后牺牲于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前线。莫斯科的汉学家虽然没有遭受到列宁格勒汉学家们那样的不幸，但是许多随大专院校撤离的汉学家在偏远地区的教学和科研条件也是极其恶劣艰难的。1943年第二代汉学家组成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莫斯科工作组，阿列克谢耶夫、郭质生、鄂山荫、郭路特、伊三克等人开始了第三代汉学家的培养工作。

1929年苏联中国研究所创办了《中国问题》为发表汉学家们的